

西南古籍研究

1987

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考證

西南夷列傳自稱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從

解鈴應曰從在漢嘉作音非在趙嵩

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北

蜀書十卷

施樊編輯

卷

行

雲南界內程途第一

安南城漢元二年伏波將軍馬援上

所案馬援交趾後漢光武帝建武十

去交趾也四十八日在莫時城建武

充分发掘民族文化宝贵
遗产，使中华民族文化宝库
更为丰富多采

西南古籍研究创刊纪念

白草亭 于北京 一九八四年

西南古籍研究

1987年

目 录

《滇志》琐记·····	王 云(1)
新发现的天启《滇志》校阅本·····	王 云(10)
方志渊源与云南历代省志成书体例篇目辨析·····	李景煌(16)
《新元史·云南行省宰相年表》补正·····	方龄贵(49)
《云南丛书》叙目·····	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(79)
《元史·释老传》八思巴事迹订补·····	方 慧(110)
《爨龙颜碑》点校注译·····	杨 蕊 杨正先(132)
《爨龙颜碑》笺注今译·····	平难先(159)
云南豆沙关唐袁滋题记摩崖刻石阐释·····	严斯信(186)
《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》标点·····	薛 琳(201)
疑年录六续·····	夏敬观遗稿 卞孝萱整理(230)
后记·····	(395)

《滇志》琐记

王 云

刘文征纂修的天启《滇志》，是一部重要的云南通志，颇受世人重视。1978年末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得睹《滇志》的写本，增强了责任感，便一面商量复印，一面进行探索。因为纂修的资料偏少，纂修主要依据的包见捷《滇志草》早已亡佚，《滇志》写本又流出省外，故存在许多疑难和悬案。经数年的努力，幸师友的协助，资料不捨巨细，议论择善而从，情况已逐渐明朗。现加整理，和同志们继续探讨。

纂修人身世

明崇祯十年(公元1637年)，由经筵讲官王锡袞撰文，兵部右侍郎傅宗龙书丹，巡按河南河东等处盐法杨绳武篆盖的《皇明太中大夫太仆寺卿右吾刘公配淑人张氏合葬墓志铭》，记述刘文征的生平较详细，但不完备，其他资料就更为零星。

刘文征，字懋学，号右吾，云南右卫人，其故居在今昆明市金碧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附近。生于嘉靖三十四年(公元1555年)，万历十一年(公元1583年)进士，天启六年(公元1626年)卒。万历十一年，刘文征任新都令，屡经升迁，官至四川按察使。升陕西布政使，他“封印登舟长往”，未到任。据阚勇考

察，辞职事在万历四十五年（公元1617年）。时年63岁，历官35年。查万历四十七年（公元1619年），刘文征曾撰《重修白玉楼记》（见云南省图书馆藏拓片），可知他辞职后，已回到昆明。以后朝廷一命再命，“公凡三辞”，坚决不就。“于是有加衔之令，以太仆卿致仕”。

在墓志铭中，王锡衮着重叙述刘文征做官清正，深受崇敬的事迹，因而“廷推皆贤”，以“清望”著名。清与廉密切相关，旧社会民谣说：“一任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可是刘文征官至行省政要，却并不富裕。墓志铭说，刘文征病重时，“犹呼嗣君，以某田偿某金”。作者不禁赞叹道：“穷约一至于此，真近世所创闻也。”这就是刘文征的可贵品德，评价是有根据的。按天启四年（公元1624年）刘文征所撰《重修太平寺并常住碑记》（见云南省图书馆藏拓片）记载，信士张士孙等捐银，为寺院买到刘文征次子刘璠坐落大普吉的田17亩，连同璠子刘芝馨“加找”，共163两。

巨 著

墓志铭称：“公好学，坐卧不离卷帙，晚年益嗜奇书”，“著《茶花馆集》、《思母编》、《松注》、《滇志》，总若干卷。”惜流传下来的仅《滇志》一种。

《滇志》33卷，约100万余字。从《凡例》得知，主要依据李元阳《云南通志》、包见捷《滇志草》两志，并博收各郡县志，采访群书档案，加以鉴别印证，增删编成。全书分《地理志》、《旅途志》、《建设志》、《赋役志》、《兵食志》、《学教志》、《官司志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祠祀志》、《方外志》、《艺文志》、《羁縻志》、《杂志》、《搜遗志》等十四

类。《旅途志》和《鞞摩志》中的《土司官氏》为《滇志》所独有，《搜遗志》增补的资料特多。《滇志》是明代最后纂修的云南通志，以记事完备、资料丰富著称。

刘文征长期做官，阅历丰富，晚年辞官回乡，潜心著述，做出贡献，他的学术思想，尚须全面研究。惟有两事，可见一斑。一、他在《滇志·星野图》中写道：“近者大西利玛窦《球图》谓：大地在天中仅一点，中国在大地上仅八十一分之一。”并发出“天有定象，人无定形”的见解。这说明刘文征已接触了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。对于善男信女向寺院施捨财物一事，他写道：“瓢锡所止，率依住持；讲习所存，定饶党徒。非布缕莫御寒，非再食不疗饥。虽以闲云野鹤之身，犹资耕夫织女之力。”（《重修太平寺并常住碑记》）认为“出世间法”，还须借“世间法”维护。思想平实，并不鼓吹迷信和宣扬因果报应。这些思想，无疑会对他的学术活动发生积极作用。

《滇志》成书后，学者纷纷征引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云南备录》十二目，全出《滇志》；顾氏《肇域志·云南》二册，多取材于《滇志》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·云南》，有五处征引《滇志》。编纂康熙《云南通志》诸志，均极重视，“故言滇史者，受天启《滇志》之影响甚大”（方国瑜氏语）。

存 本

《滇志》流出云南，通过辗转复印、传抄，现在共有九部，内一部残缺。

（一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滇志》写本，1933年入藏。33卷，28册，不著编者姓氏。书写笔迹出于三四人，楷书，间有

简笔字别体字。上钤四家收藏章。这是现存《滇志》的母本，除后二者正在查考外，其余都是它的复印本或传抄本。

(二) 湖北省图书馆藏晒蓝本。我于1978年底到武汉，亲自查明，其卷数、收藏章与北大本一致，是它的晒蓝本，仅多“中南军政委员会图书室”印。按：中南军政委员会是建国初期七大行政区之一，驻武汉，早已撤销，因此《滇志》转归湖北省图书馆。承地方志目录学家朱士嘉先生函告，这是张国淦先生生前出让的。

(三)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复印本。1979年从北大复印。

(四) (五) 云南省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藏传抄本。《新纂云南通志·文艺考二》载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北大晒蓝《滇志》一部，“避寇携滇，昆华、北平图书馆假抄副本”。时在抗日战争初期，《滇志》由是重显于世。“昆华”是云南省图书馆的前身，所藏传抄本完好。“北平”是北京图书馆前身，据吴景熙先生函告，该馆《滇志》传抄本仅残存卷一、卷八两册。此晒蓝本是不是湖北本，尚难确定。

(六) (七) 云南大学图书馆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藏抄本。均从云南省图书馆转抄。

(八) (九)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、台湾藏抄本。此系朱士嘉先生新近函告，是否属于北大本系统，尚待了解。

收 藏 小 史

最早著录《滇志》的，是明崇祯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，王锡袞撰刘文征夫妇合葬墓志铭，见前述。次为清康熙三十年（公元1691年），丁炜康熙《云南通志·序》说：“以癸亥通志合之

刘文征所纂李元阳、包见捷旧本。”此后《滇志》隐而不显，300年来的流移转徙，详情已难稽考。幸写本上钤有“卧象山房”，“诸城邓邨棣华书屋尹氏宝藏”及“东武尹氏珍藏”，“湘乡陈毅鉴藏”，“北京大学藏书”诸收藏章。循先后顺序，跟踪求索，各方支持，终于理出了头绪。

（一）徐炯携《滇志》北上。原来认为“卧象山房”李澄中把《滇志》带出云南，后承周詠先先生相告，某日记中有《滇志》资料。便急购阅徐炯《使滇杂记》（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书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），才改变了看法。

《杂记》缘起说，康熙二十六年（公元1687年）夏，苦旱，清廷派遣行人赴各省视察。徐奉命出使云南，于六月十五日出发，九月丙子朔到昆明。日记中多次提到读《滇志》。

“（九月）二十九日，天寒，读《滇志》一册。”

“三十日，又读《滇志》二册。”

“（十月）初三日，又读《滇志》一册。”

十一月，徐炯公毕，离昆明，取道贵州回京。十二月过黄平，由沅水放舟东下。

“（十二月）十一日，舟中得晏起。……泊平溪卫，雨雪。读《滇志》三册。”

“十二日，寒风飒飒，围炉坐舟中，快读《滇志》四册，得解寂寥。”

“十四日，天寒如昨，雨雪杂下，霏霏终日，山景更佳。读《滇志》三册，泊瀘口。”

次年三月，徐炯回到北京。

日记没有购买《滇志》的记述，但看他六天读《滇志》14册，不仅在昆明读，在归途舟中也读，他来云南比李澄中早三年，故《滇志》应是徐炯带出云南的。

(二) 李澄中首钤收藏章。《滇志》“凡例”下钤有椭圆形“卧象山房”章，这是李澄中收藏《滇志》的有力根据，虽然也没有购置记载。

李澄中（明崇祯二年—清康熙三十九年），山东诸城人，字渭清，号渔村。拔贡生。康熙时举博学鸿词，预修明史。室名卧象山房。有《卧象山房集》、《滇程日记》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（公元1690年），李澄中奉命典试云南，考选举人。通志赞扬他，“先条示：文非清真正雅不录。……滇士文气之衰，澄中实起之。”康熙《云南通志》收录他的七律七首，其中“百战关河余旧垒，孤城烟火半斜晖”、“故垒几经秋草没，荒城依旧夜鸣啼”，深富怀古之情。

十月，李澄中离昆明，行至杨林，为明初云南学者兰茂的事迹深深感动，吊其墓，瞻其祠，徘徊不忍去。遂捐金修葺，并撰《兰先生祠堂记》（按：碑现存），称为“百世之师”。

李澄中预修明史，对云南一往情深，他收藏天启《滇志》，殆非偶然。

(三) 诸城尹氏两代人收藏《滇志》。收藏章有二：一为“诸城邓村棣华书屋尹氏宝藏”，一为“东武尹氏珍藏”。按：东武县，汉置，隋改诸城县。所以两枚印章实际是一家人的，可是棣华书屋主人是谁，却一直查不清。1986年11月，函托青岛挚友诸城裴景颜同志帮助。裴君很快设法访获尹氏后人，西邓村（原邓村）退休教师尹燕谋君，于十二月复信。尹燕谋的祖辈尹辉宗、尹兴宗，长次二人同中咸丰癸丑科进士，兄弟友爱，用“棣华书屋”做共同书斋的名字。他们继同县人李澄中之后，收藏《滇志》，这是《滇志》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按：《诗·小雅·常（同棠）棣》：“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后因以棣华喻兄弟。其后《滇

志》由尹辉宗子尹彭寿（尹燕谋的嫡曾祖）继续收藏，这时产生了有关《滇志》的一条附注。附注说：“《滇志》三十三卷，诸城尹氏有明抄不全本，售与厂估，缺五卷（懿荣）。”诸城尹氏，指尹彭寿，拔贡生，任兰山县教谕，有《山左金石志》等著作。懿荣，即清末金石学者甲骨文发现人王懿荣，山东福山人。王与尹私交甚厚，在尹处看到《滇志》，写了上述《附注》。惟北大《滇志》写本不缺五卷，可能王氏未看到全帙。光绪三十四年，邵章刊印他祖父邵懿辰著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，增加自编的《续录》，将王氏《附注》收入。1959年，由中华书局合编为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，《滇志》附注，见p.292《滇略》之下（陈绍业、熊德基采访函告）。

（四）湘乡陈毅收藏，钤“湘乡陈毅鉴藏”篆文章。陈毅，字诒重，号郇庐。光绪二十八年中举，三十年中进士。官刑部候补郎中，邮传部参议。清末民初人，有著述，余不详。

（五）安于北京大学。民国22年（1933年），北京大学图书馆以640元重金购置《滇志》，加盖“北京大学藏书”章（陈绍业代查）。这是唯一有据可查的收藏。它安然在现代高等学府已逾50年。

北大本的时代

这有两种意见。王懿荣定为“明抄”，当有所据；北大购置人认为是“清抄”，可以讨论。至王重民先生意见，“疑是咸、同或咸、同以后写本”（见《中国善本书目录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），则是不确切的，因为李澄中在康熙时就收藏《滇志》，他怎么能见到咸同写本呢。

我个人认为是明末写本，主要依据是书中有避讳现象。一

是“由今溯癸卯”，“由黑水入三崇山”，“雍由调”，“由是”等，凡由字都写作繇，仅一、二两卷就有44处。二是“南夷校尉”，“设云南诸路学校”，“校书郎”，“检校司徒”等，凡校字都写作较。按：明熹宗名朱由校，年号天启，《滇志》成书于天启间，按封建社会严格的避讳制度，不能直接写皇帝的名字，而要用别的办法，这里是用繇、较同音字代替由、校。查《滇志》后面所列的缮写员孟显浩、徐汝暹，他们的名字也见于前述《重修太平寺及常住碑记》，说明他们是天启时人，所以抄书时按避讳规矩办。还有书中称明朝为“本朝”、“我朝”、“国朝”或“皇明”，也是当时人的口气。

另一种意见，认为是清抄本。理由是清人抄明代的书，缮写员一般是照录，不能因为北大《滇志》写本避明熹宗讳，就认为是天启时的写本。这有一定道理，但不甚充分，可以继续讨论。

是否刻印

这也有两种意见。前辈方国瑜、梁之相先生认为已刻印，因为《滇志》三十三卷末页，已列“李春荣督梓”，“承行志书吏周师尧”，“刊志匠头陈信、王家相”等执事人员名单。我认为如已刻印，总会有刻本流传及记载，但至今未见，故未必刊印。

可能的情况：已经做好刻印准备，因为发生大变故，未能实现。这是常有的事。天启五年（公元1625年），安效良等土司叛乱，昆明、安宁、石屏大水。六年，刘文征卒。天灾人祸，影响《滇志》刻印，是可能的。

北大《滇志》，属何性质？它并非底本，因书写清楚，没

有修改痕迹；也非付印本，因系三四人抄写，工拙不一，且有错漏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大段引自《滇志》，经用四部丛刊本与之仔细对勘，发现《滇志》卷三十《土司官氏》，一处漏抄一整行20字，一处漏抄“打牛坪驿”一条。还有多处，《滇志》误写而前者不误。由此推想，《滇志》写本不止一部，顾炎武参考的《滇志》不是北大本，而是另本。北大本很可能是《滇志》的清臚本，或当时过录本之一。

北大《滇志》写本虽然存在讹漏，但却是唯一幸存的孤本，因而是十分珍贵的。

1987年5月1日修改

新发现的天启《滇志》校阅本

王 云

天启《滇志》校阅本终于发现了，这是《滇志》流传史上的大事，应当向学术界报喜。

向来研究刘文征天启《滇志》的学者，尤其是亲见其书的，均确指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写本。

北大《滇志》写本的特点。

（1）全书三十三卷，线装二十八册，总计一百万多字。

（2）用云南白棉纸专印的直行格抄写，每面十一行，满行二十字，骑缝鱼尾上端刻“滇志”二字。

（3）全书由四位缮写通吏分别抄写，字体不一，书写工整，间有错漏。

（4）书中由字作繇，校字作较。按明人避讳，用同音字代替皇帝及尊长的名字，明熹宗名朱由校，年号天启，《滇志》写本用同音字代替“由、校”二字，可知书成于天启末年。

（5）现已查明，北大本于清康熙二十六年，由行人司行人徐炯带往北方。此后的收藏家，根据收藏印章，有山东诸城“卧象山房”主人李澄中（康熙间），山东诸城邓村“棣华书屋”尹辉宗弟兄及辉宗子尹彭寿（至光绪间），湘乡陈毅（清末民初），民国22年（1933年）由北京大学购藏。

(6) 北大系统传本现有七种：①北大本，为母本。②晒蓝本，湖北省图书馆。③复印本，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，④⑤传抄本，抗战初期，昆华、北平两图书馆借晒蓝本传抄，前者现由云南省图书馆特藏，后者在北京图书馆，仅存卷一、卷八。⑥⑦转抄本，云南大学图书馆及云南省历史研究所，据云南省馆特藏本转抄，转抄本又有新的错漏。

(7) 与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云南备录》互校，北大本卷三十《羁縻志》中，将“打牛坪驿”、“打牛坪巡检司”及“沙桥驿”、“楚雄县”分别混抄为一条。对此，有见识的学者认为，顾氏征引的《滇志》不是北大本，当是另外的本子。现在这一推论可以证实了。

1986年冬，参与云南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审定《滇志》校点工作，及时向全国方志目录学专家朱士嘉先生通报。1987年四月，朱老函复，《滇志》还有两种写本，一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，一在台湾，嘱为查考。当即提出要点，函托民族研究所赵衍荪同志代查，据赵同志寄来初步考察的资料，《滇志》另一写本终于发现了，与北大本相校，特点非常明显。

(1) 卷数相同，都是三十三卷，惟缺帙卷十三《官师志》。卷一前面有序言四页，用宣纸书写，柳字体，末署“光绪乙巳保山吴熙识于弇山官廨”（详见另文）。序言称：“光绪甲辰，余宰弇山，有持以求售者，因善价获之。”吴氏为清代云南保山盛族，关心家乡文献，以滇人获《滇志》，庆幸“楚弓楚得”，入藏于苏州云南会馆，以待“有志宗邦文献者所资为考镜。”

(2) 全书用白棉纸写录，均系仿宋体字。

(3) 避讳现象和北大本相同，也避明熹宗朱由校名讳由、校二字。序言作者吴氏认为书成于天启末年，这一判断是

正确的。

(4) 北大本卷三十《羁縻志》混抄的两处，中央民院本不误，说明经过校正。

(5) 北大本末卷末页职事人员名单上，龙允升、刘惟馨后面没有注明职务。中央民院本则为“云南武定府儒学生员龙允升、云南府儒学生员刘惟馨较阅”，多“较（校）阅”二字。说明《滇志》纂成后，先誊录了北大本，又经龙、刘校阅，订正错漏，用仿宋字写录，成中央民院本。

(6) 收藏情况。有据可查的三家：①弇山县令吴熙，详见吴氏序言。②钱大昕，“大昕”篆文小章盖在第一页。钱氏嘉定人，乾隆进士，清代著名学者，著述宏富。③镇洋县，镇洋县印篆文及满文硃印，盖在每册封面上。清雍正二年置镇洋县，治所即今江苏省太仓县。1912年并入太仓县。明太仓学者王士贞在其家乡筑弇山园林，后人因以弇山为太仓县的别称。清改置镇洋县，镇洋县也可称弇山。吴熙序言称“余宰弇山”，即任镇洋县令。

与此相关，“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·云南备录》凡十二目，全出天启《滇志》”（方国瑜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第一册）。顾氏，昆山人，其《天下郡国利病书序》作于康熙壬寅（康熙元年，公元1662年），他是最早大量征引《滇志》的学者。昆山、嘉定、太仓相邻，天启《滇志》曾经在这一带的学者中长期流传。

综合以上情况，可以得出结论：《滇志》两种写本均成书于明天启末年，北大本可称为清臚本。中央民院本可称为校阅本，《滇志》是否另有写本的悬案已宣告解决。

刘文征辞官回昆明，竭尽后半生精力，纂成巨著《滇志》并做了出版准备，惜他逝世后未能刊行。二百八十年后，乡人

吴熙以善价购获校阅本，期待后人研究，也未能及时发挥作用。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，党和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，整理文献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，吾人方得以并获《滇志》双璧——清臚本及校阅本。校阅本无疑优于清臚本，为研究校点《滇志》提供珍贵资料，实为学术界幸事。

至于台湾《滇志》写本，究竟属于清臚本系统或校阅本系统，还是第三种善本，尚不得而知。但愿海峡两岸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，希望台湾学者提供资料和高见，完满解决问题。

1987年11月5日于海南岛海口市旅途属稿

11月24日昆明改完

附录：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天启《滇志》 写本吴熙《序言》

赵衍荪同志函告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天启《滇志》手写本，用白棉纸书写，全部系仿宋体。卷一前面有吴熙《序言》四页，用宣纸书写，柳体。光绪末年，弇山县令云南人吴熙，关心家乡文献，以善价购《滇志》手写本，非常高兴，写了《序言》，入藏于当时苏州云南会馆，期待“有志宗邦文献者所资为考镜”。现归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收藏。

这部写本重新发现，无疑是《滇志》流传史的大事，爰加注释，将赵同志抄寄的《序言》公诸学术界。

王 云 87. 11. 23

吴熙《序言》如下：

《滇志》三十三卷，不知何时付手民〔1〕，亦不详纂者姓

氏^{〔2〕}。《序例》谓：“旧志十七卷，叶榆李仁甫编，杀青于万历（改元）癸酉。《新志草》二十二卷，万历癸巳（卯）脱稿，畹町包汝钝所辑。”又谓：“由今溯癸酉，已是五十年前，汝钝氏取前志而笔削之，即使刊布，尚軼岁年之半，而竟没没也。”^{〔3〕}即所云以考其时，当在天启朝，且其志科目至天启乙丑止，则书成意在天启末祀乎^{〔4〕}。卷帙视前志增加，为类（以上第一页）凡十有四，盖包氏本李氏为损益，是编则宗包氏稿纂述之，其有疑信相参，舛伪杂出者，则印证旧志及郡邑志，以折衷一是，编辑亦云勤劳矣。夫志为文献之征，郡要于邑，省要于郡，纂修之弊，非滥即略，信今传后，固甚难焉。滇省分野在井鬼觜参间，唐宋以前，虽或分设州郡，而地既荒远，仅等诸羁縻。元明以迄我（以上第二页）朝，始悉就疆理，因其山川形势，以控制遐方，政化所渐，风俗变革，人物蔚起，有托而传，舍志奚属。是书为当时刊行副本，缮写工整，借帙卷十三《官师志》。然体例精审，引证宏博，纂言纪事，详简有法。虽天启后皆阙如，而由此以溯前闻，则固灿然毕陈已^{〔5〕}。光绪甲辰^{〔6〕}，余宰弇山^{〔7〕}，有持以求售者，因善价获之，“楚弓楚得”^{〔8〕}，理或然欤（以上第三页）。适姑苏^{〔9〕}构会馆成，爰藏其间，以谗来者，倘亦有志宗邦文献者所资为考镜者乎。

光绪岁次乙巳保山吴熙^{〔10〕}识于弇山官廨（以上第四页）

注 释

〔1〕 已经查考，《滇志》实未刊行。

〔2〕 天启《滇志》，刘文征纂，北京大学所藏写本，也未标明纂者姓氏。

〔3〕 系引《滇志·序例》。

〔4〕 吴氏判断《滇志》成书于天启末年是正确的。

〔5〕 以上是序言作者对《滇志》的评述，对写本的概述。